

河西史前畜牧业的生成及其特点^{*}

杨富学 陈亚欣

内容提要:河西地形狭长,气候环境独特,加上来自祁连山的丰沛水源,使得这条走廊既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孕育,也便于牧业的发展。从考古资料看,河西地区的原始农业文明要早于牧业,牧业文明是由原始农业文明转化而来的。较早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以农为主,兼事畜牧,至马厂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开始由农向牧转化。延及四坝文化,已成为典型的牧业文化,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狩猎业与采集业,形成多种产业并存的生业方式。后来,分布于河西走廊西部的骊马文化和河西东部的沙井文化,尽管都是外来的,并非土著,但都保持了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相同的以牧为主的生业特点,均为定居的畜牧业而非通常所谓的游牧。这种状况的形成,乃受河西走廊自然条件的限制所致,同时也是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关键词:史前文化 河西走廊 畜牧业

河西走廊地处内陆,为一独立的地理单元。独特的气候环境、狭长的地形,加上来自祁连山的丰沛水源,使这条走廊孕育了发达的农牧业,“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①是众多古代先民理想的栖居地。早在西汉张骞“凿空”之前,河西地区就已经成为贯通东西方的交通孔道,而且社会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考古学资料为此提供了丰富证据。河西地区史前遗址星罗棋布,大致来说主要包括:马家窑文化(前3100—前2700年)、半山文化(前2600—前2300年)、马厂文化(前2200—前2000年)、齐家文化(前2050—前1955年)、四坝文化(绝对年代为前1950—前1550年)、骊马文化(绝对年代约为前1000年)、沙井文化(前700—前500年)等多种文化类型。^②本文拟以近百年来的考古资料为依据,对河西走廊地区史前牧业文明的生成与发展略加考论,以探求河西牧业文明的特点及河西不同考古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河西史前生业由农向牧的转化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用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人类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除了能够捕获猎物用以果腹外,还能够将猎捕到的活体动物圈养起来,以备捕不到野兽时食用。当人们圈养的动物越来越多,动物的性情越来越温顺,野生动物的驯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逐渐转化成可以蓄养的家畜。人们采取饲养、放牧等方法繁殖动物,以实现食用、役使的目的,这就是最初的畜牧业。通常而言,畜牧业也常被称为“动物饲养业”。畜牧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 杨富学,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兰州,730030,邮箱:1584322834@qq.com;陈亚欣,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兰州,730030,邮箱:738559980@qq.com。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批准号:14JJD770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50引《西河旧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

② 关于河西史前文化序列,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145页;张学正、张朋川、郭德勇《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50—70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427页。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据考古资料显示,河姆渡遗址中已出现畜圈。^① 先秦时代,畜牧业在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河西史前经济形态表现出复杂的特点,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人们会随之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考古资料表明,马家窑文化是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古文化(前 3100—前 2700 年),主要分布在武威、酒泉地区,而且遗址点分布稀疏,仅在个别地点发现零星的遗物。^② 在马家窑文化之前,河西是否有人类居住仍未可知。河西史前遗址较早期者显示出的生业方式一般以农业为主,以马家窑文化为典型。马家窑文化的生业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兼营饲养业。^③ 马家窑以后则体现为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此可以马厂文化为代表。至齐家文化以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四坝文化可为其代表。这与俞伟超对西北史前生业方式转变的论断是一致的。俞先生认为,中国西北地区自大地湾至齐家文化的遗存,经济主体为锄耕农业,同时包含着程度不同的狩猎、渔捞和畜牧的经济成分。后来转变为以牧为主,兼营农业。^④

与之相类的情况又见于欧亚草原。学者们对欧亚草原畜牧业发展史的研究证实,放牧养畜业是由农业发展而来的,“它是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开始,这一分工在中亚地区出现的日期是在塞人时代”;放牧养畜业同时又是“向游牧养畜业过渡的不可避免的阶段”。^⑤ 游牧养畜业作为主要生业方式在欧亚草原的出现,大致在公元前 9 世纪,其“不仅比渔猎经济晚得多,而且也比原始农业和原始的定居的养畜业较晚”。^⑥

根据对四坝文化至沙井文化这段时间之内的文物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河西走廊地区的畜牧文化自身的个性特点非常鲜明。四坝文化广泛分布于山丹以西至新疆东部,内涵丰富,是河西走廊地区独具特色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绝对年代为前 1950—前 1550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⑦ 目前已经发掘的四坝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酒泉地区,包括玉门火烧沟遗址、砂锅梁遗址、酒泉干骨崖遗址、西河滩遗址及下河清遗址、瓜州鹰窝树遗址,此外还有山丹四坝滩遗址、民乐东灰山遗址、西灰山遗址等。其中,民乐东灰山遗址是一处灰沙土累积形成的长椭圆形土丘,文化层堆积厚度在 150—200 厘米之间,最厚处在沙土丘顶部,可超过 200 厘米。^⑧ 文化层内含有陶片、兽骨、炭渣等遗物。西灰山遗址位于东灰山遗址附近,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为一个直径约 300—400 米的圆状土丘,平均厚度在 150 厘米左右,堆积文化层中包含陶片、兽骨、石器以及个别小件铜器。^⑨ 山丹四坝滩遗址的范围较广,由于受到农耕等活动影响,灰土暴露在地表。据考古工作者试掘之发现推测,这里的文化层堆积至少有 50 厘米。^⑩ 地上散落的陶片很多,部分可以复原成完整器。

诸如此类的文化层堆积在此后的骗马文化(分布于张掖、酒泉、敦煌、玉门、瓜州等地)和沙井文

①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 413—414 页。

③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1 页。

④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8 页。

⑤ [苏]A. 伯恩施坦著,罗志平译:《中亚古代游牧民族史的争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民族史译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10 页。

⑥ [苏]Л. П. 波塔波夫著,万颀安译:《论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的本质》,Л. П. 波塔波夫等著:《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 页。

⑦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第 144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 423 页。

⑧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著:《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 169—170 页。

⑩ 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

化遗址(分布于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中也有发现。^① 河西地区史前遗址目前经过正式发掘者为数不多,现已得到发掘的那些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如沙井文化永昌三角城遗址,在其西北角处发现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10—220厘米,堆积层内含大量的炭粒、草木灰、陶片、弹丸、兽骨等遗物,异常丰富。^② 民勤柳湖墩遗址也是沙井文化之重要遗址,多被流沙覆盖,遗址文化层厚达4米左右,内涵非常丰富,有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兽骨等遗物。^③ 骊马文化各遗址中也有深厚的文化层堆积,包含有丰富畜牧业文化遗物。

二、史前河西牧业文化的内在联系

河西史前考古学文化在东西部略有差异,主要体现在齐家文化之后。东部的考古序列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西部序列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骊马文化。^④ 河西走廊与畜牧业有关的史前遗址主要包括四坝文化、骊马文化以及沙井文化。探讨河西走廊畜牧文化的个性特点,需将这几种与畜牧有关的文化视为一体,再与其他相关文化进行比较。

河西走廊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多变,不同区域间的资源条件差异甚大。例如民乐东灰山遗址相较于四坝文化的其他遗址而言,其地理环境适于发展种植业,所以在东灰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很多农作物籽粒,说明种植业比较普及,同时存在家畜饲养业。尤有进者,在四坝文化彩陶中可见到不少绘有鹿、麝、羚羊等动物的纹饰,说明当时狩猎业是重要的经济补充。大量如石镞、弓弭等细石器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在骊马文化、沙井文化中也存在种植业、畜牧业和狩猎业兼营的现象,究其原因,当与两种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四坝文化之前,河西走廊分布着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从年代上看,四坝文化的绝对年代要晚于马厂文化,而骊马文化晚于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相对来说属于最晚者。西城驿文化蔓延时间更长,大体分为三大期: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二期文化遗存较为复杂,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三期为四坝文化早段遗存。^⑤ 其中,马厂文化对四坝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马厂文化之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本的,但已经开始由农业向牧业过渡。至齐家文化,牧业成分已占据主导地位,但此后原始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据一定位置。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河西走廊地区的经济形态在马厂文化以后便由原始锄耕农业转化为畜牧业,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强烈变化,即新冰期气候的出现以及人口的膨胀和压力的增大导致了生业方式的转化。^⑥ 不管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可以肯定的是河西史前生业形式由农向牧的转化,大致始自马厂文化与齐家文化时期。直到四坝文化,尽管畜牧业已占据主导地位,但种植业仍然是比较发达的。再延及骊马文化、沙井文化,种植业比重更小,但仍占一定比例,应是受其前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上述诸文化具有相对延续的关系,相互之间有所影响,如四坝文化主体是河西地区的马厂文化经“过渡类型”遗存发展而来的。马厂文化虽延续了西北旱地农业的传统,但遗址中出土

①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第14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424页;李水城、水涛、王辉:《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J. G. Andersson, Research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Stockholm, 1943.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③ 周飞飞:《民勤县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与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0页。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427页。

⑤ 陈国科、王辉、李延祥:《西城驿遗址二期遗存文化性质浅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⑥ 水涛:《甘青地区早期文明兴衰的人地关系》,氏著:《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86页。

的推测为与奶制品制作和使用有关的器皿说明马厂文化畜牧业的存在与发展,饲养的动物主要是猪羊和牛,而遗址中细石器的发现比较普遍,暗示了变迁时期各种生业方式的共存。

有一点值得注意,河西发现的晚期陶器多数有器耳,如四坝文化中出土大批单耳罐、双耳罐、四耳罐、双耳壶、三耳壶、四耳壶,有些盆也带有单耳和双耳,还有部分双腹耳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单耳罐和双耳罐,^①沙井文化陶器中双耳罐和双耳壶数量最多,占到了沙井文化陶器总量的50%以上。^②此外,杯也是沙井文化中常见的器物,特征很突出,分单耳和双耳两种,这种陶杯以敛口者居多。在以牧业为主的地区,动物奶及奶制品在草原民族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高比重,而这种陶杯很适合盛装液态食品,适宜于牧业生活。

四坝文化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在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有存放粟米的陶瓮,上述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发现有多种作物籽粒,均可见种植业很普及。但此时四坝文化中已经有了包括羊、牛、马、驴、狗、猪在内的家畜,其中羊和牛为主要饲养家畜。在玉门火烧沟遗址现已发掘清理出的312座古墓中,出土物有彩陶、石器、金银器、铜器,其中金银器与铜器并存的现象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鲜见。火烧沟墓葬中还发现了各类兽骨,如狗、猪、牛、马、羊等,其中羊骨数量最多。^③四坝文化还存在狩猎业,主要狩猎鹿、兔、羚羊等野兽。与马厂文化相比,四坝文化细石器比重有所增加,细石器的使用也更加普遍,但石器制作普遍粗糙,显示了生产方式的粗放。

四坝文化之后,在其故土又兴起了与之没有多少直接继承关系的骊马文化。据考,这种文化为乌孙的遗存,^④是一种外来文化,后来又随着乌孙的西迁而在河西地区消亡。骊马文化时期,河西走廊的畜牧业比重进一步增加,这表现在骊马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作物种类减少,家畜种类主要是羊、牛,还出现了骆驼和马这种大型食草动物,但不见猪骨。猪的饲养要以农业发展为依托,骊马文化中猪的饲养减少,说明其种植业比重在下降,畜牧业得到强化。

与骊马文化同时或稍后兴起于河西的是沙井文化,应为月氏的遗存。^⑤沙井文化的经济形态更多地倾向于畜牧业,已发展到稳定状态,饲养动物种类繁多,规模也很大。沙井文化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很少,而用于畜牧的铜刀、箭镞却占有很大比例,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皮革制品,尤其是草原气息浓厚的青铜器物,如鹰头饰、鹿形饰、犬纹牌饰、涡轮形饰等,^⑥都彰显出北方牧业文化的色彩。

由此可知,史前河西地区的生业方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具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特点,即畜牧业是与农业、狩猎业甚至是渔猎业同时存在的。四坝文化、骊马文化和沙井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面貌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而不断展示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作物籽粒、动物骨骼、细石器或渔猎用具。这种多元经济的并存,究其原因,首先与当时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自不待言;其次就是其他文化影响的结果。河西考古文化时期,随着牧业经济的发展,畜牧产品食用有余,可用来换取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农产品、日用品和装饰品等,而大型家畜马、骆驼的驯养,又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河西先民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逐步展开。^⑦

①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143页。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第142页;李聚宝:《“舜甯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④ 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瓜州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页。

⑤ 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瓜州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第507页。

⑥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永登榆树沟的沙井墓葬》,《文物与考古》1981年第4期。

⑦ 杨富学、陈亚欣:《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三、史前河西牧业的定居特点

提到畜牧业,在大多数人眼中,其经营者一般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终年居无定所,就像古代叱咤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突厥、蒙古那样。其实,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形态和生活习惯。河西走廊地形狭长,两侧为高耸的山脉,受内部山地隆起影响,走廊境内地貌复杂,独特的地形地貌制约着河西先民对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大量的考古学资料证明,河西走廊早期畜牧业是以定居形式存在的。惜学界大多泥于成说,未作深究,习惯性地把这种定居的农业冠以“游牧”之名。有学者言:“以游牧为主要形式经营畜牧业的方式早在距今4 000年的马厂文化时期已经出现。”^①也有学者虽认识到河西史前畜牧业先民是定居的,但仍冠以“游牧部族”,认为“事实上游牧民族也过着定居生活,并在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冶金、制陶、制革、纺织等手工业。”^②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三角城遗址的发现证明,游牧民族实际上存在着相对定居点。”^③这些说法既将河西的这些先民冠名为“游牧民族”,却又言其过着定居生活,混淆了游牧与住牧的区别,显然是说不通的。

当然,这里所言“定居”“住牧”,都只是从大体上相对而讲的,并不能由此而否认游牧生业方式与之同时存在的可能。河西史前畜牧业,有可能存在“大定居,小游牧”的情况。具体而言,就如同今天河西有些牧民那样,设一定居点为大本营,作为安置老幼生存之所和冬季人畜的安居地,定居点附近草场夏秋时节妥加保护,以资冬用。夏秋季节,部分青壮年赶着牲畜,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逐水草而游牧,冬季回归定居点和家人团聚。河西史前畜牧业,如果真有游牧存在,就应该是这种情况,否则无法与地下出土考古材料相契合。河西考古学文化所见畜牧业具有明显的住牧特点,看不出游牧的征候。深厚的文化层堆积,以及先民们设计建造的建筑遗迹,也都表明他们曾经从事着定居的畜牧业。

史前时期的河西走廊存在大量含牧业文化的聚落。就四坝文化而言,囿于大多资料尚未公刊,聚落形态不得而知,但在民乐东灰山遗址的中部偏东处发现有一段夯土墙,长约520厘米。^④另外,在该遗址中还采集到一块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约10厘米的日晒砖(土坯),^⑤推测当时可能存在土坯建筑。酒泉干骨崖遗址是四坝文化遗址中经正式发掘的遗址之一,其中发现了用砾石垒砌的房院墙残迹,且在灰层下面发现了柱洞的遗迹,^⑥可见当时有用砾石构造的建筑。2003—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酒泉西河滩发掘的大面积早期四坝文化遗址中就有房屋基址53座,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房屋内部及四周还有柱洞,房屋内有羊、猪、牛等家畜的骨骼,以羊骨最多。另外,西河滩遗址中还发现7座结构略显简陋的陶窑,窑内陶器与四坝文化其他遗址中的陶器风格基本一致,故应为四坝文化遗迹。难能可贵的是,酒泉西河滩遗址中还发现了畜圈遗存。遗址居住区附近,有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牛、羊蹄印,周围有数量较多的柱洞,是当时圈养牲畜的畜圈遗存。^⑦遗址中出土大量家畜骨骼,说明肉类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食物来源。张掖西城驿(黑水国)遗址以两座古城和极多的汉晋古墓而著称于世,实际上,其中的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也不少,这里先后出土有大量史前文物。西城驿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其栽培的作物主要有粟、黍、大麦、小麦等,

① 吴正科:《丝路古城黑水国》,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② 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著:《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7页。

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著:《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第8页。

⑥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141页。

⑦ 赵丛苍:《西河滩遗址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饲养有羊、猪、黄牛、狗等,呈现出混合型的生业形态。^①

四坝文化建筑遗迹中,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之分,所使用的材料有日晒砖(土坯)、黄土、砾石等,可见当时建筑方式和建筑材料已趋向于多样化。四坝先民致力于房屋、居址建设,前提条件就是要在某个相对固定的位置长期居住,是故,可推测四坝文化人群过的是一种定居生活。

沙井文化的面貌显示斯时的社会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有大面积聚落遗址,如永昌三角城、柴湾岗、民勤柳湖墩、黄蒿井等。永昌三角城中的高大城墙系利用天然地势用黄土垒筑而成,现存高度达4米,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城内经发掘的房址有4座,呈圆形,室内有灶坑和火墙。根据房址F4的基址进行复原,发现其形状犹如蒙古包。城内还发现14个窑穴。^②柴湾岗遗址中也发现有房屋遗迹,呈椭圆形,面积有40余平方米,室内有火塘和储物的窑穴。^③三角城和柴湾岗遗址中的房屋周围均发现有构筑散水,可见当时建筑水平很高,沙井先民十分注重居址的建设,说明沙井先民长期过着定居生活。民勤柳湖墩遗址发现有四周建有环形土墙的居地,直径40—50米。黄蒿井遗址也有用泥土垒筑围墙的圆形住址,直径约38米。^④这些残留的建筑遗迹在现代看来似乎十分简陋,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讲,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河西走廊地区发现的这些整齐有序排列的房屋遗迹、高大坚固的城墙、大面积的牲畜圈栏,再加上大量的动物蹄印、骨骼,都充分反映了河西先民长期定居的畜牧业生活状态,同时也反映出河西先民在生产水平较低条件下,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创造牧业文明的历史的过程。这在整个中国牧业文明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河西走廊与牧业有关的遗存多见于墓葬,墓地基本位于聚落附近。据不完全统计,四坝文化遗址发掘、清理的墓葬有666座,其中火烧沟遗址发掘墓葬312座,东灰山遗址发掘墓葬249座,干骨崖遗址发掘墓葬107座;沙井文化遗址发掘、清理墓葬629座,其中永昌西岗墓地发掘墓葬452座,柴湾岗墓地发掘墓葬113座,柳湖墩遗址发掘墓葬44座,蛤蟆墩遗址发掘墓葬20座。这些墓葬大都排列有序,数量很大,延续时间很久,这显示出了河西先民稳定的生活状态,即他们曾过着定居的生活。

这些大面积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一部分反映出河西先民定居生活,如大量陶器、铜器、金银器等,也说明河西先民存在一定的手工业;一部分墓葬中存在大量殉牲的现象,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很发达。

如上所言,河西牧业文明最有典型意义的为四坝文化,其遗址大致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祁连山以北地区,这些地区地形地貌比较特殊,沿山地带,黄土堆积面积不大,可供耕种的土地不多,大部分区域更适宜畜牧业的发展。当地如此深厚的文化层堆积遗址,足证四坝先民曾长时间在这一带活动,因为只有长期在某一个固定区域内进行生产生活,才有可能形成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这种文化层堆积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区域是很难看到的。虑及河西地区的地理条件与自然环境,笔者认为,史前河西经济当与今新疆地区的绿洲经济有些相仿,最适宜的畜养方式应是住牧,而非游牧。

The Generation of the Animal Husbandry Prehistoric Hexi Corridor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Yang Fuxue Chen Yaxin

Abstract: Hexi's terrain is long and narrow, the climatic environment is unique, with abundant water

① 吴正科:《丝路古城黑水国》,第49页;陈国科、王辉、李延祥:《西城驿遗址二期遗存文化性质浅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3页。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425页。

④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216页。

resources from the Mt. Qilian, making the corridor are conducive to the breeding primitive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primitive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s earlier than the husbandry, and the husbandry civilizations is from the primitive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s. The earlier Majiayao culture and Banshan culture were based on agriculture as the main culture and also has animal husbandry, and to the Machang culture, Qijia culture, start by agriculture to animal husbandry, and till Siba culture Has become a typical animal husbandry culture, with animal husbandry as the main culture and also with farming, hunting and gathering, became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Later, the Shanma culture in the west of Hexi corridor and Shajing in the west, though they are all not came from China, also kept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Qijia culture and Siba culture which the main culture is animal husbandry. It's the settled animal husbandry but not the nomadic. The formation of this situation is restri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in Hexi corridor,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Culture; Hexi Corridor; Husbandry Civilizations

(责任编辑:丰若非)

《中外金融组织变迁:基于市场-技术-组织的视角》

(兰日旭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本书在长时段、中外比较的视角下,按市场-技术-组织分析框架,梳理和归纳金融组织演进中变与不变的内涵。以金融组织演进中市场与组织边界交替所隐含的外部性问题为线索,总结中外金融组织演进中的共性与差异;金融组织演进中隐含的金融基因在传统阶段逐步从其他行业中分离出来之后,至今未变,但其形式中外起点相似、近世分化,当前发展中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可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以中国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本身就是原有金融组织服务能力有限、金融市场细化不足而供需失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金融市场细化、化解融资难的作用;而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则高度细化,金融组织的供给几乎涵盖了各个层次的需求,互联网等技术的引进更多的是为了改善和提高金融组织效率、降低交易费用、解决融资贵的问题。两者发展的不平衡,可能为未来趋同甚至超越奠定基础。本书系“中外经济比较研究”丛书之一种。(魏明孔)